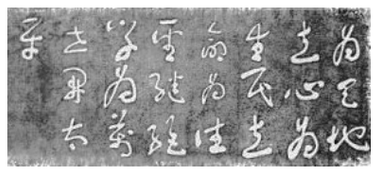
用典释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讲话原文】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出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宋）张载《张子语录》

【解读】

张载，宋明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他在继承儒家自强不息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中体现知识分子济世救民情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名句。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出自清人黄百家在其父黄宗羲《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中所加的按语：“百家谨案：先生（张载）少喜谈兵，本跅（tuò）弛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自重如此。”。

“为天地立心”，天地岂有心乎？张载《诗书》称：“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所以“天地之心”，就是张载所言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民爱物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依循宇宙本体弘扬并确立仁民爱物之心。

“为生民立命”，源于孟子的“立命”思想。《孟子·尽心上》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认为，一个人不管寿命长短，如果通过修身尽心知性，其个体之人就可以安身立命。“为生民立命”的“生民”指民众，扩而大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有安身立命之处。

“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孔孟所代表的先儒；绝学，指中断了的儒家道统。宋儒认为，孟子以后的儒家道统已然断绝，所以要把先圣快要灭绝的学术传统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

“为万世开太平”。“太平”观念，源出于战国，盛行于东汉，成为后世普遍追求的社会理想。至北宋，范仲淹、李觏（gòu）等人提出“致太平”的主张。但张载不局限于当下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远的视野展望万世的太平基业问题。“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后世开创出千秋万代的太平基业。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分别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心灵的关系。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如果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个人理想，那么“横渠四句”就是儒家的用世抱负。

（杨立新）

经济学不能脱离社会政治

——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 高长武

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能脱离社会政治、追求纯而又纯的研究，而只有结合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整个社会实际，才能透过经济表象看到问题实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为他历经15年呕心创作而成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的序言，最初发表在1859年1月的英国《人民报》上。

序言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一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次序和方法；二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三是马克思多年研究成果的基本结论；四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和概况。其核心内容是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首次从经济和哲学相结合的高度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高度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根本指导。

马克思在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和分析，主要包括四个要点。

一是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内在基本结构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组成。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生产都是构成社会主体的人的活动，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二是概括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也即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社会意识是指社会精神生活过程，包括社会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建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既为经济基础服务，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三是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这就需要对生产关系作出调整和变革。同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必然会推动经济基础的变革，而与之相对应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持续的矛盾运动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根本动力。

四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逐渐演进的客观进程，“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马克思在序言中还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著名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论断是对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必然”论断的丰富和发展，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既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毋庸多说，单就一点就值得我们深入寻思：马克思为什么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一本研究资本、商品、货币的经济学著作中，加写这样一篇重点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序言呢？

笔者以为，马克思此举主要是向人们表明这样一个道理：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能脱离社会政治、追求纯而又纯的研究，而只有结合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整个社会实际，通过分析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结构、劳动价值关系、阶级剥削关系等问题，才能透过经济表象看到问题实质，进而概括和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就是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要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这一用意，需要弄明白他创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衷。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到《莱茵报》担任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政府当局和媒体在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摩塞尔农民状况、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但马克思在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较少，使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由此，他“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以便“解决苦恼的疑问”，于是他于1843年创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但他仍觉得他对经济学的研究还不足以对以庸俗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于是又在1857到1858年间创作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加写序言的一个主要用意也就很明显了：就是针对以庸俗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上存在的弊端，阐明马克思所创立和开展的政治经济学与它们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庸俗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弊端，是脱离社会政治，追求纯而又纯的研究，只专注于分析经济表象，而忽视分析社会政治结构和劳动价值关系。当时庸俗主义经济学的典型代表，是19世纪中叶由法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巴师夏和凯里提出的“经济和谐论”。这一论调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的社会实际，美化“资本主义是最符合人性的舞台设计”，“它能以最快的速度去积累财富”。为了揭露和批判这种论调，马克思曾于1857年7月专门写了《巴师夏和凯里》一文，指出巴师夏和凯里的研究“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他们“所从事的，无非是对于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

因此，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无的放矢，而是思考良久、有的放矢。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创立的标志之作，那么这篇序言则是其点睛之笔。而由这篇序言也可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窥见一斑。

真理的光芒不仅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而减弱，反而历久弥新。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今日中国，重读这篇序言，对于廓清“脱离社会政治，追求纯而又纯的经济学”“奉西方经济学为圭臬，食洋不化”等不当认识和做法，进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论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特别是如下两点尤须重视。

其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注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注意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凭空而来、“纯之又纯”的书斋理论，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以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不可能离开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而独立存在和发展。

其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但不能食洋不化，更不能舍本逐末。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有益成分，我们当然要注意学习和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依样画瓢，更不能模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我们应该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重读经典

2016年第9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聚焦

深化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

□ 吕红娟

分类管理是公务员管理“硬骨头”中的“硬骨头”，牵一发而动全身。2016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全文公布，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分类管理的制度框架体系基本确立。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公务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不同类别公务员范围如何确定？怎样破解聘任制公务员管理的精细化问题？公务员分类考录到底分多少类、分级与否？发达国家公务员分类改革有何经验？作为我国公务员职位分类管理改革的首批试点城市之一，深圳市公务员分类改革情况如何、怎样评价？针对公务员分类改革中的这些热点难点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9期特别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解析。

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需要解决哪些难点问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公务员管理室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梁玉萍教授对公务员分类改革有着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她认为，分类标准与细化、明确职位职责规范、保持不同类别公务员平衡是当前公务员分类改革实践面临的难题。此外，她认为，在宏观层次上，公务员分类改革是改革“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微观层次上，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公务员的考录、考核、职务级别、工资待遇、教育培训等具体的管理制度。这就要求在分类管理制度框架体系下构建体现职业特点的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可以提升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促进公务员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不同类别公务员范围如何确定，以及相应的职务与职级如何设置，这是公务员分类改革中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分类改革的核心难点。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宋世明认为，职位是职务、职责、职权的核心要素。建立在职位调查、分析、评价、规范和归类基础上的科学的职位设置，才是划分不同类别公务员范围的坚实而微观的起点。同时，他对如何确定专业技术公务员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范围进行了具体论述。

公务员聘任制是近些年社会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早在2006年，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复同意在上海市开展公务员聘任制试点。试点情况如何？如何进一步推进公务员聘任制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行政研究室主任石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认为，公务员聘任制具有自身的制度优势，对于公务员队伍建设、促进廉政勤政、提高工作效能，大有裨益。但是，我国聘任制公务员试点工作中遇到一些困惑。比如：聘任制公务员职位适用范围与标准问题、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方式问题、聘任制公务员的激励与保障问题、聘任制公务员的合同管理与依法管理关系问题、聘任制公务员与常任制公务员的“一体两制”管理问题等。如何破解这些问题，石凯认为，应从结合公务员职位分类管理，丰富聘任制公务员招聘方法，畅通职业发展通道，明确相关法律适用范围，加强公务员聘任制研究等几个方面，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公务员聘任制。

针对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中的具体问题，比如考录、培训、考核等，应怎样正确理解呢？上海市宝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社局副局长、区公务员局局长吕所良及该区人社局公务员管理科副科长陈强针对考录问题联合撰文强调，在条件成熟时，推进以职位分类为基础的公务员分类考录顶层设计，是深化考录制度改革要务。对此，至少需要统筹思考如何分、如何考、如何管等三个基本命题。如何分，重点是以公务员职位分类为依据，将现有公务员录用考试整合后划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等三大类；如何考，重点在于考什么、怎么考，并做到考准考实；如何管，重点是做好分类考录的题库建设和专家队伍建设。

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国家尤其以英美公务员分类管理为代表，他们不断探索、改进和完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英美公务员分类管理经验与发展对于当下我国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具有怎样的启示与借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顾丽梅简要介绍了英美两国的公务员分类改革历程，认为英美两国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具有以下特征：两官分途：政务官、事务官的分类管理；整合性：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的有机整合；规范性：公务员分类管理日益规范；企业化：公务员分类多元化，设置政府雇员制；流动性：公务员职位结构公开透明。这对我国公务员分类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深圳是全国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其5年来的改革实践如何评价？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郝玉明总结了深圳市分类管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他认为，深圳既有改革先行先试的成功经验，也有改革探索中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职位分类改革的目的要明确；职位分类的范围界定要科学；需要建立与分类改革相配套的各项管理制度；需要做好改革的组织、财政及理论的充分准备。这些经验值得在今后的分类改革中予以吸收和借鉴。

报刊聚焦

强行者有志

□ 张文海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道家创始人。曾担任过周朝藏书室史官，生活年代略早于孔子。《史记》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事后给予老子极高评价：“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学无常师，老子是他很尊敬的老师之一。老子著《道德经》，又名《老子》，其中名句荟萃，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柔弱胜刚强”等，启人心智、发人深思。

老子关于“强行者有志”的思想，提出志的主体是强行者。强行者才有志。潜台词是说，坐而论道者、空谈者、空想者无志。这一思想确实包含着实践论的意义。何谓强行者？强，从字面理解，是除暴、除害、除弊、除险的意思。自胜者强，强又是自胜，自胜就是认识并克服自身的诸多局限比如恐惧、自私、贪婪、虚荣、懒惰、追求安逸等人性弱点，挖掘自身的最大潜能，自行解决遇到的各种矛盾问题。行，即行动、实践，指危险、困难面前积极行动、积极应对。强行，是面对困难、干扰、阻力，有条件要向前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向前冲，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内在地有目标、有责任、有驱动力，这个驱动即为有志。反过来，志在谁手？志在强行者手中，强行者因为有志才强行。真有志才能不怕苦难、危险、灾祸，排除万难前行，这才算强行者。战胜自我是强，勇于实践是行，两者结合才算有志。解放战争时期四野有句名言：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在理解中执行。其中讲的执行命令，也是强行的意思。

老子还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实现志的方法论，为世人提供了实践志的基本路径：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老子的志就隐藏于《道德经》。中心是探求为圣之道，认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为一般人不为的事，做一般人说不到想不到的事；“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强调圣人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圣人常善救人”，圣人以拯救人为己任；“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强调圣人舍弃安乐、奢侈、骄纵。



干部国学苑